

試論《女神》

陳永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072/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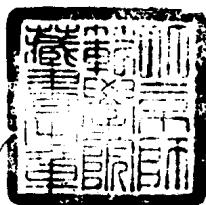
试论《女神》

陈永志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2533



上海文艺出版社

73253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试 论 《女 神》

陈 永 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 字数 101,000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 197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9,000 册

书号：10078·3104 定价：0.41 元

编　　辑　　例　　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阐述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历次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研究著作要为思想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服务；同时，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时代.....	1
二、世界观.....	5
三、学会写诗.....	24
四、生活实践.....	28
五、民族尊严.....	31
六、叛逆的女性.....	38
七、反军阀的怒火.....	43
八、新社会的赞歌.....	49
九、个性解放.....	58
十、社会主义因素.....	66
十一、创作方法.....	75
十二、独特风格.....	84
十三、典型形象.....	92
十四、写作技巧.....	98
十五、自由体.....	108
十六、开一代诗风.....	118
十七、历史的比较.....	124
十八、深远的影响.....	130
十九、版本.....	134

DC32/03

一、时代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在“五四”新文学战线上，在“五四”新诗的初创期，一位杰出的怀着烈火一般热情的青年诗人出现了，他就是郭沫若；一部闪耀着战斗光辉并具有伟大意义的诗集出现了，这就是郭沫若的《女神》。《女神》是诗人郭沫若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间作品的选集，共五十七篇，其中绝大部分、最优秀的部分，都是写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至一九二一年四月。

这期间，世界历史进入新的时期。

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成功了，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平定了国内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开始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并在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巩固了。

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激发了各国人民的斗争热情。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也以英勇的斗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各国共产党先后成立，全世界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

诗人侨居的日本，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新的发展，思想界呈现出左倾的色彩，一九一八年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冈

山、福冈这两个诗人读书的地方，运动也猛烈地展开着。

这期间，诗人的祖国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一九一九年爆发了。

中国产生了新的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毛主席根据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新发展，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对于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相互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力量，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五四”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人民大众，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斗争。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和经济的。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政治力量必然产生新的文化。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我国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开展了反封建斗争。“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这支文化生力军，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样，有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毛主席曾对它作了经典性的分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①《女神》中的多数作品，写在五四运动之后，因此，可以说《女神》是诞生在我国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时期里，特别深刻地反映了“五四”革命精神。关于五四运动，毛主席作了完整的分析：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9页。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①

我们用这么多篇幅，抄录了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所阐述的各个方面在《女神》中都有着形象的反映，它对于我们理解《女神》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面貌，对于我们评价《女神》的历史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段话还简括地指明了《女神》诞生的时代特点。

在世界历史的新时期里，在中国革命的新时期里，在我国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时期里，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伟大的“五四”风暴，孕育了《女神》。时代召唤着诗人，鼓起诗人胸中的激情，但只有当诗人的生活实践和时代的革命潮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当诗人的热情由笔尖流到纸上的时候，《女神》才光彩夺目地诞生。《女神》是诗人和时代结合的产儿，是诗人主观条件和时代客观要求结合的产儿。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59—660 页。

二、世 界 观

诗人的主观条件之一，就是他的世界观。在《女神》创作期间，诗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形成，泛神论哲学思想已经确立，并且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了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观的影响下，在哲学观的基础上，诗人吸取中外的文学营养，确立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想。这就是诗人在《女神》期间世界观的状况。

在诗人世界观的各个部分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无疑是强有力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个思想的形成，要追溯到很早了。还在少年时代，诗人就接受了富国强兵的思想，他家乡蒙学堂门口挂着“储材兴学，富国强兵”的对联，这大概是他最早接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随着现实的革命发展，和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要求相结合，具有着不同的内容。当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在酝酿和发动的时候，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论战的时候，诗人“卑屑”康、梁，“崇拜”孙中山，他拒绝了改良主义，强烈要求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具有明确的革命观点。当时的四川，改良派占着优势，而诗人能坚决接受革命思想，这是特别可贵的。辛亥革命时，他曾为乡邻写了这样的一副对联：

“共和三脱帽，光复一戎衣。”① 表现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思想。诗人从孙中山那里接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一理想破灭了。理想的破灭，带来短暂的苦闷，就是在苦闷中，诗人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也没有消失。

怀抱着学习实际本领来报效国家的愿望，诗人离开了四川，告别了祖国，一九一四年初到达日本。诗人虽远离祖国，但却一直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军阀统治、军阀混战给祖国带来新的灾难。“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夜哭》）——这是他对军阀混战造成祖国贫弱的愤恨；“梯米太仓中，蛮触争未了。”（《与成仿吾同游栗林园》）——这是他对军阀战争的批判，对反动军阀的蔑视。诗人已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中摆脱出来，把革命精神的锋芒指向反动军阀。这是他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辛亥革命期间，诗人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寄托在祖国强盛而压倒列强的幻想中。出国之后，直接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感受到反动军阀的丧权辱国，于是，他正面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哀的美顿书已西》一诗洋溢着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热情，充满着与侵略者决战的刚毅决心和英雄气概，这是他反帝爱国思想的新内容。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给诗人以巨大的震动和鼓舞，推动了诗人政治观的发展。诗人的革命精神，经过“五四”风暴的煽扬，烈火般地熊熊燃烧起来，喷射出强烈的光和热。经过五四运动，诗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更加强烈，内容也更加丰富了。《女神》的思想内容展现了这一点。

不仅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加强了，社会主义因素也不断进入他的意识。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他是知道的，但一时还没有进一步探求的愿望。由十月革命所

① 引自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第 56 页。

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他是感受到的，但一时也没有发生强烈的共鸣。到了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切骤然改观，诗人对祖国的解放有了新的希望，对祖国的未来有了美好的理想，于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引起了他热烈的反响。诗人思想中开始具备了社会主义因素。

“社会主义因素”这个概念的内含是什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内含作了明确解释，他说：“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①可见，所谓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指民主革命时期中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例如政治领域里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城乡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承认；经济领域里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当然包括在内。关于整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说明，也适用于说明任何个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对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他们世界观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首先是指“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如果他们思想中具有部分社会主义思想，那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因素。诗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尚不具备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他世界观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主要就是接受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这一点。（在本书《社会主义因素》这一节将具体阐明）。

留日之后，不仅诗人的政治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形成了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13 页。

泛神论的哲学思想。

早在四川读书的时候，他就醉心于庄子的文章，这可以说是他的泛神论思想的潜伏期。在日本读书期间，他从学习王阳明的著作而对《庄子》又有了新的理解，并进一步被导引到孔门哲学。在与王阳明学说接近的同时，耽读太戈尔的诗，由太戈尔而认识了印度古诗人加皮尔，进而学习古印度的《奥义书》哲学。不久之后，他又和歌德的作品亲近起来，由歌德的导引而熟悉斯宾诺莎，他把这位一向被称为泛神论者的主要哲学著作都读了。由于斯宾诺莎的启迪，他对《奥义书》、孔子、庄子、王阳明的思想达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地步，终于把这些有着很大不同，甚至于本质差别的哲学思想混同起来、结合起来，而统称之为“泛神论”。

从以上关于泛神论思想形成过程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诗人泛神论思想来源的复杂性。概括起来，这来源可以归结为下列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以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十六、十七世纪的泛神论哲学。其中斯宾诺莎的影响尤为深刻，这里还包括着歌德、雪莱的影响。第二方面是我国的哲学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孔子、庄子、王阳明，也包含着陶渊明、李白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古印度的《奥义书》哲学思想。这里包含着加皮尔、太戈尔的影响。

那么，诗人从这许多泛神论前辈那里接受了什么呢？无论对于哪一位前辈，诗人都没有接受他们学说的全部体系，而只是接受部分思想，而且，他又把接受来的各种思想加以独特的混合与结合。这种吸取、混合、结合，是诗人站在革命民主派的立场上，从“五四”时代的战斗需要出发而进行的。这样，就决定了诗人的泛神论思想不同于任何一位前辈泛神论者的思想体系，而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下面，我就把这独特的内容作一个简要

的叙述。

在郭沫若泛神论思想表现最强烈的阶段里，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对这一思想作了如下的解释：

“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的悲感。……忘我之方，歌德不求之于静，而求之于动。”①

这段话包含着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两个重要内容：本体论与认识论。

先说本体论。斯宾诺莎认为“神”是“绝对无限的存在”②，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神内，一切都依神的无限本性的法则而运行，并且都循着神的本质的必然性而出”③，“人的本质是由神的属性的某些样式所构成，也即是由思想的样式所构成。”④ 这就是说，神是唯一的，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万物由它化育，人类由它生成，它又是自身存在的原因。这“神”，斯宾诺莎又称之为“实体”、“自然”。这个概念，是表示世界客观性的概念，所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就是无神论。郭沫若认为“泛神便是无神”，自然万物以及自我都是“神的表现”，正是对斯宾诺莎唯物主义观点的吸收。

至于“我即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这不是斯宾诺莎的观点。这是郭沫若从《奥义书》、庄子、王阳明那里学来的。我

①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沫若文集》第十卷第178页。

②③④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19页、17页、50页，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以下均同此版）。

们以《奥义书》为例来说明，“梵我不二”的学说是《奥义书》的主旨，“我即梵”是《奥义书》有名的命题。《唱徒集奥义书》三之十四说：“全能全智全嗅全味者，包含天地默而不乱者，彼乃吾之精神，彼乃梵”^①。“梵”与“我”都是世界的本源，“梵即我”，“我即梵”，“梵”产生万物，包容万物，“我”也产生万物、包容万物。这与郭沫若的解释相同，郭沫若只是把“梵”换成“神”而已。

《奥义书》的“梵”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和斯宾诺莎的“神”的概念，有着本质不同，但郭沫若却把它们混同起来了。他在《太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中，就认为它们的不同“只是字面罢了”，本质是相同的。这样看来，郭沫若一方面承认“神”即“自然”、“实体”，泛神便是无神的唯物主义观点；一方面又接受“我即神”，以主观精神为万物本源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郭沫若当时无法认识，不能区分，而把它们同时承受下来，这构成了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第一个基本内容，我们称之为：本体论。

再说认识论。认识论所包括的内容之一即认识过程借以实现的形式。怎样实现对“神”的认识？郭沫若认为要“无我”，即“与神合体，超越时空，而等齐生死”。这是从庄子那里来的。庄子认为只要“无我”，与“道”同体，就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就能达到“生死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的境界。这和郭沫若说的完全一样。

怎样达到“无我”的境界？“忘我之方”是什么？郭沫若提出两条对立的途径：一曰静——向内体验，一曰动——向外追求。庄子要人们“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与此类似，王阳明教人们“静坐”，《奥义书》要人们“禅定”，这些都是排斥实践经验而主张自我观照、向内体验的主观唯心

^①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第2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主义认识论，这就是所谓“静”的途径。与“静”相对立的是“动”的途径。斯宾诺莎认为最高的快乐和幸福在于知神，而知神则需要反映事物本质的正确知识，《伦理学》中称为第三种知识，这种知识愈多就愈知神。斯宾诺莎强调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虽然有片面性，但却是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在歌德那里得到延伸，郭沫若似乎感到这一点，他说：“斯宾诺莎陶醉于本体，歌德陶醉于事业。”^①不断奋斗，谋求充实，努力创造，由于歌德的诗意的表现，这观点变得更加激动人心和富有鼓舞力量，具有明显的重视实践的倾向。总而言之，郭沫若的认识论和他的本体论一样，包含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一方面认为对“神”的认识在于向内体验，陷入唯心主义乃至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对“神”的认识在于向外追求，强调人们的实践，人们的努力，是唯物主义的。

在认识论的这两个对立的内容中，唯物主义的内容更加吸引郭沫若。他自己承认，歌德的思想，包括这“动”的途径，引起了他的“共鸣”^②。或许就因为如此，他甚至把庄子和王阳明都硬拉到这条“动”的途径上来。他认为王阳明“一方面静坐以明知，一方面在事上磨炼以求仁”。^③而大为佩服的则是那“事上磨炼”的精神，很久以后对此都不能割爱，直到一九五八年，他还认为这精神是“侧重实践的”，“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一个不能调和的矛盾”。^④郭沫若强调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说明他的认识论中包含着侧重实践这一宝贵的思想，而且比之那向内体验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更为强有力。

本体论和认识论是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两个基本内容。此

①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沫若文集》第十卷第166页。

②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沫若文集》第十卷第177页。

③ 《王阳明礼赞》，《沫若文集》第十卷第45页。

④ 《沫若文集》第十卷《前记》。

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内容，这就是世界不断发展的观点，我们称之为：发展观。

郭沫若早年论述我国古代思想的文章，都强调我国先秦哲学中存在着鲜明的世界不断发展的观点，并认为孔子把这种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把三代思想的人格神之观念改造一下，使泛神的宇宙观复活了。他与老子一样，认形而上的实在为‘道’，而使与‘易’之观念相等了。‘易’与‘道’在他是本体之不同的两个假名。……本体含有一切，在不断地进化着，依两种相对的性质进化着。本体天天在向‘善’自新着。然而本体这种向‘善’的进化，在孔子的意思，不是神的意识之发露而是神之本性，即本体之必然性。”①

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本体是在不断进化、发展，不断向“善”自新，而且这是本体自身的必然性。

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认为“神”是“绝对圆满”的，“神，或神的一切属性都是永恒的。”②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它和郭沫若所理解的我国先秦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思想是矛盾的。可贵的是，郭沫若看出了这个矛盾，并且作出了明确的抉择，他说：“（孔子）认本体在无意识进化，这一点又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异趣。我觉得孔子这种思想是很美的。”③可见，郭沫若自觉抛弃了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而接受了他所理解的我国先秦

① 《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第5—6页，光华书局1925年版（以下均同此版）。

②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21页。

③ 《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第7页。